

洪炉点雪

沈志洪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洪炉点雪

沈志洪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洪炉点雪 / 沈志洪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99-9894-7

I. ①洪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沈志洪—回忆录 IV.
①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8760 号

书 名 洪炉点雪

著 者 沈志洪

责任编辑 孙建兵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32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894-7

定 价 3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辑一	故园之恋	1
辑二	军旅生涯	61
辑三	投身卫生事业	113
辑四	情系百姓健康	159
辑五	亲历新医改	203
辑六	退休生活	231

辑一

故园之恋

苏州古城西部与太湖之间的吴县地界上，有一块不足 30 平方公里的梯形丘陵冲积小平原，它的东北面是灵岩山，西南面是穹窿山，东南面是清明山。清明山下是连接太湖东出口与京杭大运河的苏西运河，灵岩山下是连接太湖与苏西运河的苏福运河，穹窿山下是直通太湖的捞桥河。捞桥河发源于穹窿山，它的源头梯度建有两个石坝水库，分别称之为上堰和下堰。在苏福运河与捞桥河之间，有东西走向的航木浜相连。

灵岩山脚下还有直通太湖东出口的箭径河。相传当年西施思念家乡，时常要到太湖边的穹窿山南麝香山咀去采香草沐浴。为方便来往，求吴王开凿一条运河。吴王站在灵岩山上的望湖台，弯弓搭箭，朝太湖方向射去，兵士们按照吴王射箭的轨迹开凿了一条运河，取名箭径河。多年后，越国军队就是偷渡太湖，从这条运河直捣灵岩山吴王行宫的。

在这块梯形丘陵冲积小平原的东南角，坐落着木渎镇，西北角坐落着藏书镇，西南角坐落着胥口镇。其中，就数木渎镇最为繁华。它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必游之地。

我的家乡小园岭村，坐落在穹窿山南麓香山咀小园岭下。小园岭是

沟通穹窿山南麓东西两地的重要山口，岭上有一块两平方米左右的大方石，村上人称之为“美人石”。相传当年西施常在此眺望太湖南面的越国，吹奏凄惋的箫声解愁，当初人称箫怨岭。后来怕招来灾祸，才改称为小园岭。村子坐西向东，前面是一条两米宽用青石块铺垫的官道，每当夕阳西下，阳光斜照在石板上，就会升腾起紫色的烟雾，煞是好看。路边是一条一米多宽长年湍流不息的溪水，女人在溪水里淘米、洗衣，孩子们在溪水里抓鱼摸蟹。

村口是崇花院寺，庙前有两棵直径一米多粗的银杏树，它与别的寺庙最大的区别是后殿不是大雄宝殿，而是一座两层楼。楼下供奉观世音菩萨，楼上则间隔成大厅和不同的房间。相传，这里是当年西施临时居住的地方。院子里筑有假山和水池，种植了许多芍药和牡丹。庙后，依山而建了一个很大的土台子，人称欢墩，是西施看戏的地方。庙的东侧不远处，就是捞桥河与航木浜的交汇处，捞桥河有十六七米宽，而航木浜只有七八米宽。

村子向北两里就是有名的茅蓬坞，当年孙武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兵书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。向南两里就是胥口镇，是吴王为表彰大臣伍子胥而命名的古镇，镇上建有胥王庙。向西翻越小圆岭，不足五里地便是著名的太湖。

沿着航木浜向东两里地是气势恢宏的藏书庙，是西汉大臣朱买臣读书的地方。朱买臣是我们村上人，相传他年轻时家境贫穷，靠每天在穹窿山上砍柴，到木渎镇上换些米盐回家，与母亲和媳妇艰难度日。但他酷爱读书，就把书藏在途中的土地庙里，每次卖完柴回来时，都要在土地庙旁边读一会书再回家，他的媳妇因看不起他而离家出走。后来，朱买臣做了大官，为了纪念这段艰难的日子，他出资在土地庙原址上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寺庙，取名为藏书庙。再向东就是灵岩山了，山上有吴王

的行宫，这是西施居住的地方。灵岩山脚下有抗金名将韩世忠和梁红玉的陵墓。东面是江南才子唐寅、金圣叹的陵墓。后山就是天平山，春秋时期就是观赏红枫的绝佳景区，那里有范仲淹祖孙四代的陵墓。

在小园岭村，我们沈氏家族自古就较殷实，最多时占有十三户，清朝嘉庆年间，因瘟疫剩下两户，到父辈时，堂叔举家搬迁到城里，我们家就继承了家族的山林和田地。

家有祖训：男丁要闯天下，女人要守贞洁。在这种家族文化的熏陶下，沈家历代的男人都在城里做事，女人在家守祖业。上山伐木，下地种田，植桑养蚕等，都靠雇工来做。

奶奶生下父亲和两个姑姑，爷爷很早就病逝了，奶奶独自一人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。

受家族祖训的影响，尽管家境很好，但是父亲十四岁就进苏州城自谋生路了。凭借着六年的私塾功底，初通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，进城以后，主要靠画折扇和画户外广告谋生，偶尔客串观前街玄妙观的大型法事。唢呐是法事里面必不可少的乐器，吹唢呐是父亲的拿手绝活，他能一口气吹着唢呐走完整条观前街，当时没人能比得了。

三年后，遵照奶奶之命，父亲与大他三岁的母亲成婚。父亲一米八二的个头，白净的皮肤，长长的睫毛，很是英俊。我母亲只有一米五八的个子，皮肤比较黑，但聪明能干。外公虽然是远近闻名的裁缝，但毕竟属于小户人家。村里人都认为门不当户不对，两人不般配。但奶奶觉得自己一个人独自支撑家业，太辛苦了，要打理好这份家业，需要一个泼辣能干的女人。所以，在奶奶的劝说下，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亲事。

不久，父亲在城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，全身心地投入革

命工作，很少回家。家里面全靠奶奶和母亲打理。1948年底，一小股从长江北面溃逃过江的国民党军队洗劫了我们家。奶奶让母亲躲了起来，独自一个人面对一帮兵痞子，斥责他们不该打劫百姓，遭到了兵痞子的毒打。更加可恨的是恼羞成怒的兵痞子不仅将我们家的家产洗劫一空，竟然还用火点燃了我家的房子，躲藏起来的母亲差一点在火灾中送命。

村里人见有真枪实弹的大兵抢劫，都逃到山里避难，没有人敢下山来救火。大火整整烧了一夜，二进三进的房子，因为中间有厢房连接，全部化为灰烬，只剩下前院平时堆放杂物，和雇工居住的五间旧瓦房保存了下来。

兵痞子走后，奶奶决计开山伐木，重振家业。

1949年5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，解放了我的家乡。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我们的山林和田地全部交给了军管会，彻底打破了奶奶的计划。多少年后，奶奶还时常埋怨父亲，这件事实在是操之过急，哪怕晚交一年，家业就能基本恢复。

山林和田地交出去之后，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的工资。随着姐姐哥哥的降生，经济愈发困难。奶奶和母亲把断垣残壁间的土地整理出来，好一些的地块种上了庄稼，都是砖瓦碎片的地就种了栗麻。奶奶买了明矾，又请工匠用木料做了土纺机，自己动手纺线织布，制成蚊帐出售，补贴家用。奶奶制作的蚊帐既好看又耐用，深受乡亲们的喜爱。

奶奶出生于东楼里的郁姓大户人家，因为坚决不肯裹小脚，长大后找不到门当户对的人家，就做了爷爷的续弦。当时，大奶奶留下一个男孩，才十几岁，后来参加了国民党军队，于淞沪抗战中阵亡。实际当家作主的，还是奶奶。

在我们兄弟姐妹中，奶奶最喜欢我。这可能跟我出生时的情况有关，

我是农历八月十八早晨出生的。之前，母亲的肚子没有任何动静，奶奶就和邻居结伴去杭州看钱塘江潮汛去了。等她回来，我已经降生了。但不幸的是，母亲染上了产褥热，高烧不退，神志不清。舅舅冒着倾盆大雨，连夜背着母亲送医院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

母亲虽然把命保住了，但是不能给我喂奶。我出生才几天，不能喂其他的东西。外公就说：“算了，孩子如果保不住，也实在没办法。”但奶奶觉得愧对这个孩子，不甘心就此放弃，就抱着我走村入户求正在哺乳期的妇女们给我喂奶。据说，当时我一共吃了三十多个产妇的奶。后来，奶奶又把我寄养到灵岩山脚下的小山村一名产妇家里，讲好每个月八块银圆，外加四听雀巢奶粉。开始照料得还过得去，第二个月，因为母亲的病情明显好转，奶奶就过去看我。当时，我染上了红眼病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奶奶见状当场就哭了，扔下银圆和奶粉，抱着我就回家了。

回家后，奶奶一边照料母亲，一边精心地喂养我，煮红枣水泡奶粉给我吃。也许是当时吃得太多了，以至于我长大后从不吃红枣和奶粉。

为了抚养我，奶奶吃了很多的苦。所以，奶奶和我的感情很深，等我长大一点，奶奶走到哪里，就把我带到哪里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奶奶每次走亲访友，都要带着我，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里，走亲访友就会有好吃的，这份待遇都归我独享。每次做错了事，母亲要责骂我时，奶奶总会护着我，事后总会告诫我一句话：你要争气一点。奶奶有一句口头禅，就是：儿子不胜爸，要他干啥。她觉得男丁是撑家的，希望我们都要有出息，一代胜过一代。

1969年1月，姐姐生下一个女儿，因家中没有婆婆，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前去照料她坐月子。奶奶带着我和哥哥守家。有一天，奶奶身体不舒服，就没有起床下地，除了坐在床上吃了一些白粥外，一直都在睡觉。

第二天上午，哥哥下地干活去了，我在家陪奶奶。上午十点多钟，听见她发出奇怪的声音，我撩起蚊帐看她，只见她双目紧闭，口唇微微张开，我就喊她，但她没有一点反应，我用手推她，还是没有反应。我慌忙把哥哥叫回家，但我们两个人无论喊她，还是推她，都没有反应。哥哥就忙去姐姐家告诉母亲，我独自在家守着奶奶。

我看着奶奶亲切而慈祥的脸，想到亲人在不经意间就离去了，心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奶奶笃信佛教，逢庙敬香，见佛就拜，她深信因果报应，平日里待人和善，从不与人争吵，哪怕吃亏也不计较。她在人们心目中，就是一个大好人。当时由于家里经济困难，只向十几户至亲报了丧，但闻讯自动来吊念的亲朋好友足有二三百人，我们家前后三个院子里都站满了人。她的去世，对我来说太突然了。在大人们一片呼天抢地的哭声中，我一个人来到村口河边，坐在一条拖上岸准备修理的小木船上，呆呆地望着远方。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：奶奶真的走了，从此没有人袒护我了，我要独立，我要为奶奶争气。

尽管心里很悲痛，但是我没有掉一滴眼泪。

出身破落家庭的父亲，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子古代士大夫的气息，清高而又自律，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。

他很少跟家里人谈他的工作，我们只是大概记得他的工作经历。

解放初期，他参加土改工作队，在外地工作。后来，到吴县文化教育局工作。1964年，又参加“四清”工作队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爆发后，跟所有干部一样，卷入“文革”的洪流之中。1967年1月，上海“一月革命”风暴中，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、市政府的权，成立了“革命委员会”，受到中央的肯定。1967年3月，苏州地区仿效上海成立了苏州地区革命委员会。由于对“革命委员会”

的看法有重大分歧，当时苏州地区的群众组织就形成了两个派别，一个是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，这一派是支持苏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的，群众称它为“支派”；还有一派是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联站，他们是反对苏州地区革命委员会，要踢开它闹革命，群众称它为“踢派”。实际上，无论哪一派，真正的骨干很少，很多人就是盲目地跟着他们走。

父亲是政府机关的干部，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“支派”。因为革命委员会不光是地区有，市里也有，县里也成立了。况且，在当时各级党委、政府都瘫痪的情况下，从上到下只有革命委员会在管事。上面会议精神的传达、文件的贯彻、生产任务的布置，都是革命委员会在做。因此，革命委员会就是一个临时的政权机关。原来政府机关的人都很自然地按照革命委员会的部署，按部就班地维护着机关的日常运转。对于两派的活动，特别是武斗，机关的人是不参与的，以至于父亲并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照常工作。但在那个非白即黑的年代里，你不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委员会，你就被认定为“支派”。

8月的一天，父亲单位的两名同志到我们家里来找父亲，但是父亲当时快一个月没回家了。看到单位里来人找，家里人都大吃一惊。这时候我们才知道，父亲为了处理一批人事档案，没有随同县文教局的同事一起撤至城外，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和单位里的人在一起了。我和姐姐跑到镇邮电局去打电话，但是电话根本没人接，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当时，我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挨日子。干爹干妈也时常过来打探消息，大干哥在南京上大学，因为镇江也爆发了武斗，邮政瘫痪了，钱寄不出去，老人家不知道大儿子怎么生活，能否平安回家。小干哥在苏州城里工作，就住在山塘街上，离后来在两派武斗中被烧毁的朝天禄很近，当时是两派争夺激烈的地盘。父亲过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有一天下午，他突然回来了，身上晒得通红通红的，一脸憔悴。原来他在“踢派”全

面封锁苏州水陆通道的时候，凭借着自己对苏州城大街小巷的熟悉，在一个靠鱼鹰打鱼为生的渔民帮助下，冒险坐小船逃了出来，后来在虎丘长青公社当时“支派”的一处营地躲避了一阵子，才辗转回到了家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

不久，小干哥也逃回了家。大干哥是在那年春节过后才到的家，在身无分文的日子里，他凭借写得一手好字，在南京夫子庙卖对联挣钱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，并凑足了回家的路费。

1968年4月，苏州地区“支”“踢”两派在周恩来总理四次亲自干预下，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，父亲去了吴县东山的“五七干校”劳动。1969年，父亲从“五七干校”出来后，任木渎镇党委书记。当时木渎镇是我们县里最大的镇，有企事业单位三十六家，最大的企业有六七百人，县政府机关曾一度准备搬迁到镇上来。第二大镇是浒墅关镇。这期间，有不少人去找我父亲，希望能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，并把将哥哥安排到浒墅关镇工作作为交换条件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有没有工作将会影响人的一辈子。但是父亲就是认死理，坚持按照原则办事，因而开罪了不少领导。

过了没多久，父亲就被贬到吴县五金刀具厂任厂长，后又调光福工商所任所长，尽管主管吴县乡镇经济最为发达的四五个乡镇，有二三百家企业，但从世俗的眼光来看，官是越做越小了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从不为自己谋私利，违反原则的事硬是一件也不做。解放初期，按当时的规定，他可以带家属进城，但他没有去办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，谁也没有经过他来安排工作。弟弟还是后来按政策规定，利用父亲病退可以顶替的名额才安排的工作。他管理那么多家企业，没吃过人家一顿饭。曾有一家企业送给他一件衬衣，他坚决不收。要知道，他是一个十分讲究穿着的人，生活那么艰苦，但他一辈子没穿过打补丁的衣服，也从来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。只有一次例外，我从部队转业时，按照规定将自

己穿的皮大衣带回了家，他很喜欢这件皮大衣，我就把它送给了他。冬天里，父亲时常会披着它。每当我看到他披着皮大衣颇有几分威武的样子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。

潜入汪伪特工总部，主任丁默村私宅。当时由于默村私人贴身秘书黄宝忠介绍给丁默村，联系后，约定今后由陈可夫、陈立夫二人，直接发密电用特种密码通信。这种密码，只有黄宝忠能翻译。黄宝忠把收发的密码写在一本小书上，人家看都不看就知道。黄宝忠大约在1944年10月，把这些密码翻译译好后交给了默村。丁默村把黄宝忠翻译好的全部密码系统整理后，向日本“东条英机”报告。过了一段时间日本政府通知汪精卫去日本开会，研究国家事务。1944年11月10日，汪精卫死在日本政府开会的会议桌上。

此材料由黄宝忠亲自对我谈。黄宝忠去全国个改后潜入某大学教授任。1962年4月某教授将黄宝忠在某教授处新到材料，新到中学任教，当时改在英文教授人，科工作。黄宝忠当时谈的视觉为面材料和改条法整理材料。

父亲八十二岁时留下的手稿

父亲是唯物主义者，强烈反对迷信，平时爱管闲事，有两件事记忆非常深刻。一件事就是趁帮奶奶做晚饭的时候，把灶王爷的神像放在大灶里给烧了。为此，奶奶没少跟他叽歪。另一件事就是阻止别人用电来捕鱼。我家周围有很多池塘，有些无良乡民就用电击来捕鱼，只要一放电，池塘里面的大鱼小虾全都死了。父亲非常痛恨这种行为，他只要在家，有空就会出去转悠，如果发现有人电击捕鱼，坚决予以制止，强行

没收工具。别人反正碰到他，只能认倒霉，也卖他这个面子，把工具乖乖地交给他了事。

父亲退休后，将工商局分配给他的两间住房退回给单位，回到了老家。为此，母亲时常调侃他是“无产阶级”。可不是吗，大家只听说干部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房子的，没听说有人分配到手的房子主动退还给单位的。

父亲利用自己在工商局的关系，帮助我们村里办钢丝绳厂，工厂办得很顺利，业务发展得很好，产品远销欧洲。他坚持不拿任何报酬，只领取一点通讯费。可是，他办事原则性太强，最后跟厂里的领导发生了一些冲突。工厂领导要去销售产品，免不了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，父亲知道了就是不让。村支书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就让他去负责村里的老年工作。他负责老年工作以后，搞得红红火火，带着老人自娱自乐，还给他们讲课，像真的一样。有一次，有一位老人跟他讲，儿子不给自己生活费，也不给他粮食吃。父亲就带着村干部，自己扛了秤，来到老人儿子家称米给老人，并教育他要善待父母。为此，他也没少得罪人。但大家都敬重他，因为他没有私心，像个老共产党员。

2011年2月，父亲因病去世，享年84岁。生前他喜爱杜鹃和兰花，我买了84盆鲜艳的杜鹃花放在他的遗体四周，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在鲜花丛中一路走好。

我的母亲也是大气侠义之人，又爱管闲事，村里人都爱称她为“大人”。

母亲自幼丧母，外公没有再娶，独自一人把兄妹二人拉扯大。外公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裁缝，但凡穿着讲究一点的，特别是姑娘婚嫁的衣服，都要请他来做。

外公的裁缝生意特别的忙，地里的庄稼活就交给舅舅来打理，家务事就由母亲来承担，所以，母亲从小就开始管家了，兄妹二人，男主外女主内，配合得倒是很默契，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。

转眼间，兄妹俩长大了，俗话说得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但外公并不这么想，他想把兄妹两个都留在家里，凭他的经济实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

不久，儿子娶了亲。媳妇一娶回家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媳妇并不了解公公的心思，就算知道也不一定愿意让小姑子继续留在家里，这样毕竟要分掉一半的家产。在她看来，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迟早是要当家作主的。于是，逐渐对掌管家产的小姑子产生了不满，经常会为一点小事发生争吵。出现这种情况以后，外公也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母亲入赘招婿的事也就一拖再拖。

一转眼，母亲已经十九岁了，这在当时的农村，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。出于无奈，外公就和母亲商议，动员她出嫁。母亲考虑再三，最终同意了外公的意见。

母亲嫁给父亲，给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她聪明能干，吃苦耐劳，也有持家的经验。当时父亲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，就缺一个女人来持家。母亲嫁过来，真是适逢其时，奶奶把家里的事都交给母亲打理。

母亲也没有辜负奶奶的期望，把家中里里外外的事都做得有条不紊，风生水起。不料，后来遭到兵痞子的洗劫和纵火，家产损失殆尽。再后来，家乡解放了，家里的山林和田地都充公了，母亲也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了。

母亲的婚姻一开始并不理想，也不和谐，因为是奉奶奶之命，母亲和父亲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导致父亲平时很少回家。后来工作忙了，回家就更少了。直到婚后五年，母亲才生下第一个孩子，就是我的